
沉痛悼念王绶琯先生

吴国盛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）

从刘华杰教授的微信里得知王绶琯先生于昨天（2021年1月28日）晚仙逝，不胜悲痛。王先生生于1923年1月15日，终年99岁。

我在1988年10月的张家界全国天文学哲学会议上初识王先生，那时他是北京天文台的台长、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，德高望重，但待人和蔼可亲，主持会场争论公允平静，不以势压人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王先生关注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，和我的专业和兴趣有很多交集，我们经常在各种学术活动上碰面。王先生对青年学者提携有加。我的《科学的历程》（19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首版）多次得到他的表扬和推荐。我也经常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送给他请他指正。

《科学的历程》^② 读后感

② 《科学的历程》，吴国盛著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5，1-173页。

在我面前的是一部科学通史。作者说明，他是为具有中学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写的。这当然包括许许多多准备步入生活、正在思考人生、憧憬未来的青年男女们。也包括各条战线上的许许多多同志，他们正在把自己的思想轨道调整到和“科教兴国”的民族命运相对接。

这部书的问世是及时的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久所盼望的。我们普及科学，回答了许多个“是什么？”和“为什么？”，但却^{一直}无暇顾及科学本身的来龙去脉，它“是什么？”，它“为什么？”。这就影响^到更^高层次上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在更广视野中科学的运用。在这里，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文明进步的祥云，掩蔽着的实不完全是些有趣的历史故事！^{现在}一部既普及科学、也普及科学史、通俗的科学通史^的问世，对我们来说，实在是十分及时的。

王先生1996年为拙著《科学的历程》写的评论手迹



1997 年底在王先生家里合影，前面桌子上摆着我的《时间的观念》和《自然的退隐》。



2005年1月16日，“科学时报读书杯2004佳作颁奖会”上，右起王绶琯先生（时年83岁）、席泽宗先生（时年78岁）。

2006年7月22-23日，北大哲学系在京郊安利隆度假村召集了一次关于“科学与宗教”的学术研讨会，我邀请王先生等老科学家参加。王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如下观点：

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之争，实际上是科学与政治权力之争。当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之后，宗教往往站在“超科学”的位置上解释并且利用科学，比如教会办的医院都是利用现代医学，而不是靠跳大神治病。历史的教训是，那怕是无神论者掌了权，当存在着不受制约的权威时，科学与当权者的意愿的矛盾仍然可以严重地阻碍科学进步。发生在20世纪的“李森科事件”就是其中一例。

宗教要处理一些科学无法处理的问题，比如生死问题。人生之中毕竟有许多不能控制的东西，宗教给人以安慰。宗教都是悲情的，直面人生残酷的一面。过去称宗教是“迷信产业”，现在看来叫“安慰产业”更好一些。

真是目光锐利、菩萨心肠，充满了智慧和勇气。



2006年7月22日合影，左起洗鼎昌（1935-2014）、王绶琯（1923-2021）、席泽宗（1927-2008）

王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北山泰斗，也是中华古诗词的爱好者，曾担任中关村诗社社长，还著有《塔里窥天——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》（2006年）。我对古诗词完全不懂，2006年夏天，他送我的这本诗集引起了先父的强烈兴趣，并且步原韵唱和了王先生的“读巴金《随想集》随想”。王先生听我说起，非常高兴，并且为先父的诗集《晚晴杂录》题写了书名，让身为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先父受宠若惊。

晚晴
九本
篆



随着王先生年事渐高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，但是他慈祥而又睿智的面容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2000年12月11日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篇“听科学家做报告”的小文，我在文章中说：“来自北京天文台的先生们几乎一色的温文尔雅、儒者风范。也许是他们长年跟宇宙打交道，懂得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人的狂妄是多么可笑；也许是他们的老台长王绶琯先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——在我看来，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。”

王绶琯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里！